白岩松：青春就是不容易

劳动·创造·奋斗
我的青春故事
团中央 全国青联主办

微寄语

要相信慢功夫、笨方法才是踏踏实实走出一条路的正确方式。

本报记者 黄丹羽

在寒风中穿过半条人来人往的胡同，戴着帽子、摘掉眼镜的白岩松并未被人们认出来。

爱坐地铁，爱读书，爱音乐和足球。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常常把自己隐藏于地铁拥挤的人潮中，享受观众视线之外的生活。“生活的真相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平淡。”白岩松说。

在白岩松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末，“梦想”的概念尚未出现，“接班”几乎是孩子对未来唯一的定义。直到恢复高考，一代人的青春才被赋予了新的色彩。

1985年，白岩松迎来了他的高考。当时，经济、法律专业火热，全班五六十人中，只有两个人选择了新闻学专业，他是其中之一。“因为曾经听妈妈的学生讲过在广播学院读书的事儿，听说可以看闲书，又自由开放，我觉得很不错。”

4年后，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毕业生开始自寻出路。“我们有了一定的选择权，但有选择不一定是幸福的，有时候也可能是痛苦的。”白岩松说，“但即便遭遇许多坎坷，我仍然觉得能自己找工作的过程是幸福的。”

最初，白岩松选择了国际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满以为前途有了着落的白岩松却突然被告知，国际台今年没有招收中文编辑的计划。国际台之梦破碎后，白岩松买好了前往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到广东一家电台碰碰运气。临行前一天，他意外接到系里通知：“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试试，或许还有机会。”

白岩松清楚地记得，面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一位大姐和他聊了一个半小时。经过几天的焦灼等待，白岩松得到了被录取的消息。

来北京十几年，白岩松从未因为工作升迁等事请过客、送过礼。“大家总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但我相信总有许多像那位大姐一样的人。我们互不相识，她却愿意付出一个半小时的代价，寻找一个他们喜欢的年轻人。”白岩松说，“要知道生活中有B面，但一定要相信生活中还有A面。”

命运终究爱开玩笑。毕业前后，白岩松又经历了几场风波，才终于正式入职，却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做报纸编辑。虽然心中充满抱怨，但白岩松也只沮丧了一个上午。“中午我就去买了《报纸编辑》这本书。因为抱怨没有用。”

在做报纸编辑的空闲时间，白岩松喜欢自己写点东西。渐渐显露的才华为他赢来了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的机会。“要知道人这一生中，命运总会来敲几次门。重要的是，你是否听得到，是否已经准备好。”白岩松说。

从一名策划到“被迫”出镜，白岩松从未想过把电视当做长期的事业。为了筹办一份名为《流行音乐世界》的新报纸，他拒绝了调进央视工作的邀请。不久后《流行音乐世界》被“毙”，白岩松才被命运推着走上了电视路。“有时候，绝望处就是转折。”

随着“东方时空”的成功，白岩松也渐渐为观众所熟知。此前，中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新闻节目主持人”。虽然自以为“做的一定很糟糕，有无数缺点”，但因为“没有可比较的对象”，白岩松还是收获了无数掌声。“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会很悦目，而森林里的仙人掌算什么呢？”白岩松说，“现在的年轻人起步时就要被拿来和我们做比较，那些粗糙、幼稚就不容易被宽容了。”

然而，每个时代都会赋予那一代人不可复制的独特青春，并且“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白岩松记得，读大学时同学间风靡一句诗：“21岁我们走出青春的沼泽地。”在白岩松看来，青春总在回忆里最美，身处其中时并不自知。“20岁时你会觉得失恋就是世界末日，而到60岁时你就不会这么想。我们要关注、关爱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机会，但年轻人自己也要明白，青春本身，就是不容易。”

吴永强：注重积累 争取机会

微寄语

年轻人在拥抱世界的同时，不要摒弃传统精髓。

本报记者 陈凤莉

在媒体圈，吴永强是成功的。他采访过将军、部长，还采访过很多位政要名人。不过当初，他可并没想过自己能走进这个圈。

十几年前刚刚会计学专业毕业的吴永强还只是一个财政部下属单位的专业职员。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本就对新闻感兴趣的他进入了新华社直属的财经媒体，开启了自己职业新闻记者的道路。

进入财经新闻圈后，吴永强并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为了能够有更广阔的视野，从纯粹的经济记者向时政等其他领域拓展，吴永强把目光放在了境外媒体上。

“不同的媒体会有不同的视野，证券报做的就只能是业内新闻，地方媒体也只是盯着自己所在的一块区域，但香港的媒体却是盯着全球在做新闻。”吴永强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个有着全球视野的记者。

香港《大公报》的记者经历是吴永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那段时间，他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平时丰富的知识积累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并写出很多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

直到现在，他仍对那些倾注了心血和热情的采访记忆犹新。“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原国民党副主席、原台湾‘行政院长’萧万长的采访。”

不过当时，对吴永强来说，那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得到的采访机会。“我是在一个公共场合偶遇萧万长先生的，先后两次向他提出采访请求，但都被婉拒了。”尽管如此，吴永强并没有放弃，在茶歇间隙，他又凑到萧万长跟前，这次，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请求，而是递上了一份用文言文写就的采访提纲。

这个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年轻人引起了萧万长的注意，随后他让人告诉吴永强，活动结束后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接受他采访。而那一次采访也成了吴永强终生难忘的经历。

“从原来的10分钟变成了53分钟，从历史聊到文化。”那一次，吴永强不仅获得了很多独家新闻，还与萧万长成了忘年交。

而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吴永强知道，是自己的日常积累帮了他。

做记者的几年里，很多重大的新闻战场上，都会有他的影子。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全国两会；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这些重大事件中，只要有机会参与，吴永强都不会缺席。

很多年轻记者觉得报道两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吴永强却总能在海量信息中挖掘到自己想要的新闻。“平时就要做大量的准备，做深入的思考，然后‘厚着脸皮’去采访。”

2006年两会，他曾针对海峡两岸、国际间高度关注的系列焦点问题，独家专访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政委、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政委的温宗仁上将。有关报道被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专节引述，在海内外政界、军界引起强烈反响，堪称突破。而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是他与温宗仁探讨孙子兵法时争取来的。

2008年两会，他曾就松花江污染问题向新上任的环保部长发问，不仅用犀利的问题在中外记者会上赢得了阵阵掌声，更为自己赢得了独家采访环保部长的机会……

在别人看来，能够访到那么多名人，吴永强无疑是幸运的，但他知道，为了做好一次采访，自己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有时候采访一个人，写一篇几千字的稿件，我要看数万甚至十几万字的文字背景资料。”

如今，吴永强已经从一线新闻记者的岗位上走下来，致力于海外华文媒体的并购以及公共外交等事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海外传递更多的中国声音。”

叶蓁蓁：做媒体人很幸福

微寄语

青年需要梦想，更需要从梦中醒来，脚踏实地做好自己。

本报记者 李 Ⅰ

“改革创新进行了10年之后，《人民日报》正在发生更大的变化！”“我们总编室100来人的编辑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1岁，在这里工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作为《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全国青联委员叶蓁蓁显然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环境。

17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叶蓁蓁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能与许多有理想、有创意、有作为的同行一起，见证一份报纸、一个行业的迅猛进步，更见证这个行业对国家改革发展的记录与推动。“党报对政策的解读、对决策的影响都有独特作用。”他说。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10年里，叶蓁蓁经常听到有人赞扬《人民日报》的变化，也同样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就不是办给我们看的。”对于前半句，他表示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媒体的自由；对于后半句，他不太认可，办给谁看，只有认真看过的人才有发言权，而说话的多半最近没有认真看过《人民日报》。

10年来，《人民日报》走过的改革之路不同寻常。2003年，视点新闻版创办。这个版面聚焦当日热点、推进深度调查，被称为《人民日报》新闻版改革的试验田。随后几年，改革以越来越大的力度迸发——体育新闻版、经济新闻版、政治新闻版、文化新闻版、社会新闻版相继创办，整个报纸亦逐步扩至24个版面。

这其中，从视点新闻版主编到总编室副主任，叶蓁蓁始终是一线的参与者，在缺乏机制保障的情况下，他和同事坚持“惟其艰难，更有价值”，探索“没有前路可循”的创新模式。一条当天的新闻，要做成一篇深度报道，记者当天要完成多个不同侧面的采访、拿回数千字的稿件，这在10年前的《人民日报》简直不可想象。然而，在持之以恒的推动和坚持中，总编室年轻的团队做到了。如今，“当日新闻深度报道”已成为《人民日报》所有新闻版的主打产品，成为版面常态。

“站在改革创新的起点，不会有机制鼓励你去创新，还会有阻力。但我们可以通过慢慢努力，逐步摸索出一个样本，并使它呈现出更大的意义。这时，原来的阻力会慢慢消失，新的机制会生根发芽，原来称之为创新的东西就渐渐成为常态，我们又要启动新一轮的创新……”叶蓁蓁这样理解《人民日报》新闻版的创新之路。

改版的同时，《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更加凸显。不久前，实施了十余年的农村地区中小学撤点并校政策显现出不少问题，受到社会关注。要闻二版推出的“关注撤点并校”系列报道，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解读、政策实施地区的现实情况、美国同类政策经历的调整过程3个角度，对撤点并校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剖析。见报后产生重大影响，撤点并校政策开始在国家范围内调整。

报道影响政策，《人民日报》的价值正在于此。叶蓁蓁说，很多报道，或许读者没有看报纸，但可能看过其网络转载；或许没注意其来源，但“党报发声”所代表的公信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开通之后，以“不同于《人民日报》”的风格引起关注和赞誉，短短几月粉丝量超过300万。微博贴近群众，报纸却高高在上，不是一个话语体系。”有人甚至用了“精神分裂”一词。对此，叶蓁蓁认为：“其实，《人民日报》微博和《人民日报》是浑然一体的，微博能报的题目，《人民日报》都能报，而且更详细；微博能用的话语系统，《人民日报》已经用了很多年，比如我们的很多评论，只是网友没看报纸或者没注意到。所以，微博既是《人民日报》开拓新媒体领域的重要一步，也是《人民日报》10年改革成果的体现和延续。”

作为《人民日报》的一员，叶蓁蓁说，自己更像海里的一滴水，得以照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记录历史、推动进步的使命，见证一份大报革故鼎新的力量，记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向上生长的轨迹，“做媒体人，很幸福！”

海上“敢死队”

（上接1版）

三级军士长阚金海第一次学习操纵训练时，下的口令自己都听不到，遥控扫雷艇复杂的结构、繁多的专业也让他措手不及。为此，他虚心向老舰艇长请教，并系统学习了《内燃机构造与原理》、《扫雷控制系统使用与维护》、《航海学》等书籍。

这些士官艇长的业务进步很快。一次，某艇的扫雷具海训时突然出现通电间断故障，艇长王海松带领艇员翻查图纸，经过20多次通电检试，终于找到了电源控制模块的故障原因。

在他的要求下，设备工厂还对其他型号的装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工厂很快全部更换了故障模块，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扫雷舰大队也努力帮助这些班长尽快向艇长转变。大队允许士官艇长以干部身份参加大队干部会议、支部书记培训，还邀请大队老的舰艇长、业务长与他们结对子，提高他们的实际操纵能力。

大队还请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为他们举办帆缆、信号、雷达、机电、灭雷等专业培训，并派艇员到厂家学习，让他们在车间生产组装线上了解艇上新装备的制造原理和生产过程。

如今，很多艇长和艇员对装备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王海松用3个月时间，和战友一起编写出《操纵控制台维护检查规程》、《扫雷具检测操作规程》等多项规章，填补了该型遥控扫雷艇装备技术保障的空白。

某艇参加海军组织的实船水下爆炸抗冲击试验，艇长冷青松带领艇员在狭窄的舱底内精确布设测点53个，确保采集数据准确可靠。实爆后，大家还向专家提出23条改进意见，为后续遥控扫雷艇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担任艇长的士官每月享受200元舰艇长补助，这200元不多，却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某年5月，士官艇长冷青松带领全艇同志赶赴东海某海区参加扫雷实兵演练。

扫雷具顺利投放后，艇员撤离，小艇在母舰遥控操纵下，准确无误进入计划航线。然而，预定距离到了，水雷依然没有爆炸，越往前危险越大，人们的心都悬了起来。冷青松果断下令：继续前进！

突然，一声巨响，水柱冲天而起，水雷被一次性成功扫爆。这是一枚国产智能化战雷，爆炸后艇体安全、状态正常，他们填补了海军遥控扫雷史上实扫战雷的空白。

水警区扫雷舰大队大队长蒋传海介绍，这些士官艇长都掌握了航海、通信、机电等专业技能，全部一次性通过了舰艇长“全训考核”，成为合格的指挥员。

水面上盛开的“水莲花”是最好的礼物

除了参加演习试验，这些士官艇长还经受了上海APEC安保、奥运安保、世博安保等重大任务的考验。从扫雷舰大队营区的楼房上望去，就是浩浩荡荡的长江，这些士官艇长熟悉身边的这条“黄金水道”。

上海世博会前，他们将长江航道的水下目标排查了很多遍，“连河底的煤气罐都被找出来了。”艇长阚金海笑着说。

然而，最惊险的还是执行扫雷任务。一年6月，正在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水警区某扫雷舰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开赴该海域执行扫雷任务。

到达指定海区后，两艘遥控扫雷艇前出，成扫描阵位开始进行扇面搜索。20分钟过去了，声纳搜索到了50多个可疑目标，指挥员迅速召集水雷专业干部和全体声纳兵，逐个排查，最终确定了3个目标。

扫雷艇越来越接近目标，识别显控台已经判断出目标类型。指挥员下达一连串口令：“灭雷部署！”“准备右舷投放灭雷具！”“机器人”顺利由吊臂放入水中，一步步接近目标。

平静的水面上突然腾空而起60多米高的水柱，这枚威力大、足可将一艘万吨巨轮炸沉的水雷被成功扫除。

熟悉扫雷工作的人知道，遥控扫雷艇的工作方式是利用扫雷具产生声场、磁场触发水雷引信，从而扫爆战雷。如果几艘艇在海上能使扫雷具声磁场达到同步，可以成倍提高扫雷效率；然而一旦出现偏差，也会使声磁场产生抵消，风险不言而喻。

这些士官艇长多次进行模拟推演，反复尝试和训练，终于使遥控扫雷艇的声磁场达到了同步。

2011年8月的一天，某海域波涛汹涌，联合扫雷实兵演练在这里拉开帷幕。数艘遥控扫雷艇并肩驶入演习区域。

“声纳报告，前方进入雷区，初步判定，可能属某型智能化水雷。”母舰作战长报告。艇上的战士们明白，这型水雷是国产最先进的智能化水雷，它能自动分辨声磁信号，抗扫能力强。

很快，士官艇长们制定出3套方案，遥控扫雷艇进入雷区，5分钟后在目标区某方位发现水雷场。

“投放扫雷具！”艇长冷青松一声令下，后甲板橙色炸弹形状的某型声磁扫雷具快速入水，人员立即随快艇撤回母舰，冷青松在扫雷主控台开始遥控指挥扫雷艇。

遥控扫雷艇趟过雷场，轰隆一声巨响，水面盛开出一朵数十米高的“水莲花”，新型扫雷艇又一次成功扫爆国产智能化水雷，一条深水航道被成功打通！

冷青松和战友欢呼着拥抱在一起，水面上盛开的“水莲花”是送给这些士官艇长最好的礼物。

何处是拐点

（上接1版）

网吧误国：民族复兴能靠宅男宅女吗？

从孩子娱乐方式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乔治·威尔斯的预言与现实趋势惊人的一致。

在城市里，陪伴孩子们的早已不是毛绒玩具和铁皮青蛙，而是电脑、手机、iPad等“电子保姆”；在农村，孩子漫山遍野玩耍的场景也是上个世纪的旧事，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周边爆满的网吧。在中小学，眼镜越来越早地爬上了孩子的鼻梁；在大学，校园里经常是静悄悄的，一个宿舍的同学不说话，也不一起活动，而是坐在各自的桌前，用QQ、微博、人人网进行交流。

教育部2011年发布的《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在继续上升，并出现低龄化倾向，7~12岁的小学生近视率有四成，13~15岁的初中生近视率近七成，两个数据均比2005年增加了约9个百分点；16~18岁高中生的近视率则有近八成，比2005年增加了3.18个百分点。

对这样的数据，一位教育局干部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即便每天都锻炼，回到家中就钻到书桌前，死盯着电脑，周末继续补课，面对的依旧是电脑，近视率还会上升！”

电脑勾走了孩子的眼睛，电脑椅则黏住了孩子的屁股。走进任何一家网吧，几乎都能看到衣衫不整、神情颓废的青少年，全神贯注地盯着一闪一闪的电脑屏幕。新闻中，隔三差五就会有青少年在网吧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甚至猝死的事件。

体质下降的一个明显反映，就是“征兵难”。长期从事军务动员工作的某军分区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从各地近3年来的兵役登记情况看，报名参军的应征青年中，独生子女占了约一半，有的地区比例更高。相对而言，独生子女家庭条件较好，从小吃苦受累少，自理能力较差，家长也不是很放心。

比起适龄青少年不想当兵的主观意愿来，更严峻的问题是，当前征兵对象的体质并不能使人“放心”。每年征兵时，因体质不合格的淘汰率在逐年增加，医院的近视手术则异常火爆。甚至有专家无奈地建议，从当今初中生以上视力越来越差的实际出发，体检标准可否增加弹性，朝“有利于提高新兵文化素质”的方向放宽。

64岁的浙江省台州医院医生戴建国已经参与了30年的征兵体检，在他的笔记中，30年来，参加征兵体检的适龄青年身体素质逐年下降，视力很少有5.0以上的，体重普遍超标，肥胖和脂肪肝等疾病已经开始出现，18岁的男青年跑3公里，有的都会累得晕倒。

多年前，被称作“中国戒网瘾第一人”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陶宏开就曾在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后，公开表示支持取缔网吧。在他看来，电脑伤害的不只是孩子的身体，也包括他们的智力乃至心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刚打完游戏的学生，在课堂上总是陷入“精神游离散漫”的状态。

曾有媒体这样描写网瘾少年待在网吧中的细节：16岁少年李某整个蜷缩在黑暗、浑浊的网吧深处，一张宽大的靠椅让他瘦小的身体完全淹没进去，他很少动弹，除非因为一次漂亮的反击激动地挺一挺身体。

中国作为网民数量第一的国家，还没有成为最先进的电脑、网络科技大国，却率先成为了世界第一的游戏大国和网瘾大国。中国孩子对体育的热爱，也似乎只停留在电视机和电脑屏幕前，他们一边熬着夜，津津有味地看着NBA联赛、足球联赛，实时关注着网络上不断刷新的赛况和比分，却不愿离开座位，迈开双腿，走上运动场。

独生子女之忧：越来越多的“不敢练”和孤僻的性格

似乎整个社会都在纵容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宅”。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与对分数的重视相对的，都是对体育锻炼的漠视。

教育投入在增加，体育的空间却在被持续挤压中。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名体育教师向记者抱怨，体育老师既是超人，又是学校最不重要的人。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排球样样都要会，还要现学现教太极拳、跆拳道、民族舞、瑜伽，甚至要帮学校编课间操。课多的体育老师一周要上20多节课，还得带课间操、冬季长跑和课外活动。

师资有限，场地也有限，体育课的质量尚且不能保证，体育活动也随之流于形式。一个羽毛球场上，6个学生一起打，有的学生连球都碰不到，老师也分身乏术。

学校对体育缺乏应有的重视，家长则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名中学体育教师说，周末本来是学校篮球队训练的时间，但大多数家长以上辅导班为由，拒绝让孩子参加训练。在他看来，中国人普遍太过于急功近利了，对待孩子的教育也不例外。“因为考试分数是眼前利益，而学生体质的问题，要过十年、二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正是在家长和学校的博弈中，学生的校内体育锻炼就打了折扣，遑论课外的自发锻炼。

身为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学科带头人兼区体育教研员，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总务主任白雪生是教投掷出身的。从教几十年的他，可以清晰地画出投掷球类变化的轨迹：最开始是垒球，由于个儿大、质量重，改为投沙包；沙包比较轻，容易砸到别的孩子脑袋上，又改成扔海绵包；最后改成如今扔的实心球。

“越练越轻，孩子的体质能不差吗？”在白雪生的印象里，十年前他教的学生，冬季长跑都能跑下来；现在的孩子坚持跑一半就能得到表扬了。十年前每周两节体育课，课间操15~25分钟；现在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每周4节体育课，课间操则每天至少25分钟，“量上去了，质却没有提高。”白雪生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表示担忧，小时候不敢跳“山羊”，长大了更不敢跳了。

为什么学校和体育老师都越来越放不开手脚？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家长与学校在校园体育安全隐患方面的冲突。

白雪生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体育老师在学生投掷实心球之前让学生做准备活动，一名学生并没有按照老师的指令来热身，在投掷过程中把腰闪了，且伤势不轻。这就很难判断责任是属校方还是学生自身。白雪生说，如果属于学校责任的安全事故，做起来已经是“保金钱容易，保名誉难”，而在那些难以判断责任方的安全事故面前，校方就更加被动。

因此，即便是有意外伤害校方责任保险这样一项由学校埋单的公益保险，并未改变体育老师“谨慎”的教学：该撤的铁饼还是得撤，上课从来不用的双杠则继续不用。

一名小学体育教师记得，曾有一个学生受伤，他给学生擦了一点碘酒消毒，没想到学生家长来学校大闹，说这样会给孩子的皮肤留下色素沉淀。从此以后，学校的医务室再也不敢帮学生处理伤口。

“孩子在体育运动时很容易出现受伤的情况，万一发生事故，学校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另一位中学教师如是说。他担心学校因此而干脆不开展体育活动，从而利用这段时间变相给孩子补习文化课。

因为怕出安全问题，学校的体育课从大球到小球“越练越轻”，课外时间则索性将孩子都关在教室里，不让出门，用讳疾忌医的方式来规避风险。甚至有校长说出了“宁可让学生坐死，也不让学生跑死”的惊人言论，对体育的漠视走向极端。

对于独生子女广受指摘的“自私”、“不懂事儿”的问题，似乎也能从体育中找到答案。

CBA名将刘力铭就曾在指点孩子打篮球时表示，篮球的精髓是团队精神，同样地，参加集体性的体育锻炼也能锻炼这种团队精神。刘力铭说，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受到家长的关爱很多，但却缺乏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通过篮球训练，孩子能和团队一起承受输赢来培养自己的责任感，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体育培养的不仅是团队精神，还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探索精神。两句俗语已经佐证了这一逻辑，一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坚持就是胜利；另一句则是，体育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位体育老师告诉记者，赛场上胜负难料，一切充满变数，因此，在他们眼中，体育比赛是最会诞生奇迹的，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可以轻易放弃。

北京的一位中学生则感觉到，在运动中，自己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锻炼了心理素质，从而能够正确地面对成败得失。“领先、落后，成功、失败，是体育的两对孪生子。我们不必为一时的成败而论英雄，不能太过专注于结果，过程更加重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历练，经得起成败得失的考验，才会有一个稳健的心态。”他说。

在西方国家，家长常常鼓励孩子去拼搏、去流血、去面对失败，体育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大多数学生将体育视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也在感受快乐，锻炼意志。而反观中国父母，往往是孩子一受伤就心疼得大呼小叫，培养出害怕竞争、畏手畏脚的“食草男”，也就并不奇怪。

加长体育这块“最短的短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在不少学者看来，人力资源强国之“强”，不仅仅在于脑力，更在于足够支撑脑力的体力。身为心理学家的王登峰司长曾公开表示，体育锻炼对一个人的智力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人的智力在6~16岁之间的发展是最迅速的，而在这个期间，不参与体育活动，对于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则有着极大影响。

从学理上讲，人的聪明与体育也有着可论证的关系。前者通常与大脑的结构、机能有密切的关系，决定于大脑皮层细胞突起分枝的多少，神经细胞之间联系的复杂程度，以及信息冲动的传导速度。而不少的保健医生则认为，体育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大脑的结构与机能，并加速信息的传导。

换句话说，一份漂亮的体质健康测试单，对于一份全是优良的成绩单有着正向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要建立创新型社会，靠的不仅仅是只知道“锻炼”脑子的人才。尤其是要培养出富有组织和协调能力的领军人才，不仅需要智育，更需要体育的参与。

历史也曾给出过佐证。比如，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就多出自马约翰的一小时“强迫运动”。一百年前，马约翰来到清华园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在他的督促下，刚入学时身高只有1.49米、体重不到50公斤的钱伟长成为了清华著名的中长跑运动员；在“五项测验”中，吴宓跳远只能跳到3米5，而3米65是及格线，因此被扣了半年，体育及格后才得以去美国留学，等等。

梁思成在晚年时回忆说，“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事实上，马约翰的初衷很简单，“我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至今，清华大学还有42个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项目。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又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激励着一批科学家在投身科研的同时，强身健体。

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这句口号却仍未得到实质性的施行。

“我们现在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培养的人也总得像点样子，不能是‘东亚弱夫’吧？”王登峰认为，为实现2020年建成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体育是一块“最短的短板”。“要用8年时间把下降了将近30年的指标夺回来，我们压力非常大。”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此拿出了17条硬梆梆的措施。其中首次提出，要完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评价制度，“各学校每年对所有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并将测试结果经教育部门审核后上报纳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要实施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制度，从2013年起组织开展中小学体育工作评估；要实行学校体育报告公示制度。

这是一场真正的硬仗。倒计时已经开始，我们还等什么？